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TANGDAI JUNQUAN YU

HUANGZU DIWEI ZHI GUANXI YANJIU

Tangdai Junquan Yu Huangzu Diwei Zhi Guanxi Yanjiu

唐代君权与 皇族地位之关系研究

雷艳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

唐代君权与 皇族地位之关系研究

雷艳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之关系研究 / 雷艳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61-4811-2

I. ①唐… II. ①雷…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
中国—唐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591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海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王娟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308 千字
定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文库受厦门大学“211工程”三期“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985工程”公共管理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及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建设项目的资助。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

编 委 会

(由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组成)

主 编 陈振明

编 委 朱仁显 李明欢 陈炳辉 卓 越
胡 荣 黄新华

总 序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领域，而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急需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创新研究。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施政府管理创新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依法行政的水平。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当代国外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大量亟待解决的关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因此，加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以及公共服务的创新研究，对于推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向前发展，增强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应用，更好地服务于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治理与政策创新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我校就设立了相关的系科，中间几经调整分合及停办。80 年代中后期，作为国内首批恢复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科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我校复办政治系，不久更名为“政治学与行政学系”，2003 年成立公共事务学院。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以及原来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始终把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作为学院的发展重心。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设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点（另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二级博士点），行政管理国

家级特色专业,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和政治学理论三个省级重点学科,福建省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公共政策与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福建省“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福建省公共政策教学团队,厦门大学“211工程”三期“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及“985工程”——公共管理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厦门大学“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研究”创新团队等。

我校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研究与教学走在全国前列,已经形成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专业结构比较合理、创新能力较强的人才团队。其中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青年教师奖”获得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及特等奖提名奖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福建省高校名师、福建省“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和“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等优秀人才;并形成了包括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政策分析、政府改革与治理、公共服务及其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社会管理及社会保障、国家学说、新政治经济学、社会性别与公共事务等在内的多个特色和优势研究领域或方向。

作为厦门大学“211工程”三期“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及“985工程”——公共管理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研究成果,“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文库”围绕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这一核心,遴选我院教师“211工程”及“985工程”课题研究成果以及优秀博士论文汇集出版,旨在显示近年来我院公共管理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加强与国内外学界的交流,推进我国公共管理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创新与知识应用。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陈振明

于2011年4月6日

(厦门大学九十华诞纪念日)

目 录

导论	(1)
一 研究缘起:由李唐皇族地位变迁引发的思考	(1)
二 研究回顾	(3)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	(10)
第一章 高祖重用皇族与巩固君权	(12)
第一节 武德储位之争的缘起	(12)
第二节 高祖预防控制储位之争	(24)
第三节 唐突关系与李世民成功夺权	(37)
第二章 太宗加强君权与重视皇族	(55)
第一节 君主意志与贞观储位之争的引发	(55)
第二节 晋王治之立与君权局限	(67)
第三节 储位之争中的皇族地位透视	(76)
第四节 皇族婚姻与皇族地位	(85)
第三章 高武时期君权提升与皇族遭难	(103)
第一节 永徽显庆政局与高宗巩固君权	(103)
第二节 高武时期储位变更与武后夺权	(117)

第三节 君权提升与武后篡权之联系	(131)
第四节 武后篡唐与李唐皇族遭难	(145)
第四章 中宗享受君权与压制皇族	(159)
第一节 中宗朝储位之争缘由	(159)
第二节 李重俊起兵失败之由	(168)
第三节 储位之争中的李唐皇族与武氏宗族	(180)
第五章 睿宗淡泊君权与保全皇族	(194)
第一节 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争缘起	(195)
第二节 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中央人事较量	(203)
第三节 权力争斗中的睿宗	(209)
第六章 玄宗扩张君权与皇族没落	(225)
第一节 储君废立中的君权透视	(225)
第二节 玄宗朝的皇族政策：基于君权扩张手段的分析	(238)
第三节 皇族政策与中晚唐宦官专权之联系	(259)
第七章 君权、皇族与中晚唐政局	(272)
第一节 储位争端中的中晚唐政局	(272)
第二节 君权扩张与皇族没落	(285)
结论	(292)
参考文献	(295)
后记	(301)

导 论

一 研究缘起：由李唐皇族地位变迁引发的思考

《新唐书》卷70上《宗室世系上》序云：“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孙蕃衍，可谓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远亲尽，则各随其人贤愚，遂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至或流落于民间，甚可叹也！”

高祖朝，李唐皇族地位崇重、权势煊赫，入则执掌权柄，出则为要州都督、刺史。自太宗朝开始，君主逐步加强了对皇族的监督与管理，出镇地方的皇族在行使职权时，常常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与限制。高宗朝，一些皇族虽然担任地方长官，但其权限与一般地方官员并无差别，甚至还不如他们。经过武后的血腥清洗，李唐皇族遭受重创，几成灭族之灾。中宗、睿宗朝，幸存下来的李唐皇族稍微恢复元气，但皇族间的权力争斗也随之激烈。自玄宗以后，随着“诸王不出阁，不分房”，李唐皇族的命运急转直下，皇族与王朝政治日益疏离，皇族仕途更加狭窄，遂使李唐皇族的“子孙阙而不见”^①。整个中晚唐时期，皇族的身份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更多的是灾难和厄运。

^① 《新唐书》卷70下《宗室世系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

皇族为何兴盛？唐长孺在论及西晋至唐初的“宗王出镇”现象时，曾这样解释：在门阀政治时代，“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是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以君临天下，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①。唐先生注意到皇族之间的彼此联合、互相团结，意在强调门阀政治时代家族利益对于个体的重大意义。但是，“宗王出镇”并非门阀政治时代特有的政治现象，如西汉初，汉高祖“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辅”，遂大封同姓王出镇地方，“以填天下”^②。同样，唐初以后，“宗王出镇”现象也并未从此绝迹。如明初，明太祖重视通过分封同姓王为王朝建立藩屏的作用。洪武二年（1369）四月，天下甫定，明太祖“定封建诸王制”^③。那么，对于非门阀政治时代的“宗王出镇”，又该如何解释？

考诸历史，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王朝的君主对待皇族的态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皇族际遇惊人相似。如西汉，在七国之乱以前，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王拥有相当大的权限。“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俨然一独立王国。然“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④。又如明代皇族，“当太祖时，宗藩备边，军戎受制”。同时，皇族还享有较高的社交自由，“赞仪疏属，且令遍历各国，使通亲亲”。但自明中叶以后，皇族命运急转直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不仅如此，君主还加强了对皇族的严密监控，“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如此”^⑤。我们不禁疑问，为何在王朝初期，君主一般都会重用皇族成员。随着王朝统治的加强，君主便会采取措施限制皇族发展、削弱皇族势力，导致皇族地位不断衰落。

笔者以为，君主重用皇族的“宗王出镇”现象并不能完全用中国传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9—140页。

② 《汉书》卷38《高五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

③ 《明史》卷2《太祖纪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④ 《汉书》卷38《高五王传》。

⑤ 《明史》卷120《诸王五》。

统社会政治体制转型期理论即由门阀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来阐释。同样，对于李唐皇族的地位兴衰，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认为是此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变化之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李唐皇族的没落？研究皇族地位没落的理论价值何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书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有唐一代君权状况与皇族地位的关系。虽然君主来自皇族大家庭中，表面上，两者同荣共辱；若深入其中，两者的关系远比想当然的复杂。本书以唐代储位之争为研究主线，通过考察储位之争的原因、过程、结果及其性质、特点，旨在阐明唐代君权状况与皇族地位的关系及其特点，进而从专制权力的层面揭示皇族地位变迁的深层原因。

二 研究回顾

中国传统社会的君权及其嬗变历来为学界关注，研究者主要从君权与其他权力（如绅权、相权、宦官权力）的对比中展开对君主权力变迁的探讨。

关于君权与绅权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吴晗曾指出：“绅权与皇权的关系，即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在历史上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秦到唐，第二时期从五代到宋，第三时期从元到清。”在具体谈到君臣间的礼貌时，他认为，“在宋以前，有三公论道的说法，贾谊和汉文帝谈话，不觉膝之前席，可见都是坐着的。唐初的裴监甚至和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还有坐处。可是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论政了。到明清，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奏事了，清朝大官上朝得穿特制的护膝，怕跪久了吃不消。由坐而站而跪，说明了三个时期君臣的关系，也说明了绅权的逐步衰落和皇权的节节提高”^①。他总结归纳了中

^① 吴晗：《论绅权》，载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变化，即从秦至唐的合作伙伴到五代至宋的掌柜与伙计，再到元至清的主子与奴才。吴晗意在指出，君臣间政治权力的推移与变化的后面已经蕴含着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这一研究旨趣也反映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如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至唐中叶的贵族政治同宋以后的君主独裁政治有很大不同，贵族政治时代的君主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君主“虽然可以由实力者超越等级去占领，但既然成为君主，最终便不免成为贵族政治机制的一环”。但近世的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这使得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至于宦官，他认为，“唐代宦官是天子家族中有影响力的一员，所谓‘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而明代虽然也有宦官跋扈，“但他们只是在得到天子恩宠时拥有权力，恩宠衰退时势力亦随之全失”。

虽然内藤湖南比较了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政治下君主与宦官地位的差别，遗憾的是，他只是非常概括地阐述了这些变化，但并未对“唐末至五代”这一过渡期君主的地位作进一步的论述说明。而且这一观点缺乏深入、扎实的研究支撑。同时，关于唐代君主与宦官的关系，也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事实上，唐前期君主在行使权力时完全不会受到宦官的干扰和影响，可以肯定，唐前期君主的权力远远大于唐后期的君主。宦官与君主之间“定策国老，门生天子”关系格局的形成是在中晚唐时期，准确而言，应该在懿宗朝以后。正因如此，对于唐后期君权为何出现倒退，有必要从微观层面重新认识之。

继内藤湖南之后，宫崎市定概括了唐宋变革之际社会形态的变化。他认为，相比中世频繁发生的强有力的贵族同天子争夺皇位，在近世，天子的独裁权得到了加强，“天子的地位非常稳定。财产和地位的世袭只限于天子一家”。在宫崎看来，近世天子地位之所以得到加强，主要是兵制变革的结果，唐末五代的分裂状态反而促使了中央集权的发展，使得天子直接掌握着庞大的军队。宫崎继而指出，中世的豪族拥有广大的土地和大量的依附民，中央政府必须与之合作。到了唐代，随着科举制的盛行，旧式的贵族逐渐被淘汰，在新形势下形成了近世的贵族，即士大夫阶级。中世的贵族集团与近世的士大夫阶级的区别在于：“中世的贵族以家为本位，

而近世的士大夫则以个人为本位。要想做高官，必须先应科举。……在中世，官位未必是万能的，……然而在近世，官位却是绝对的。”^①

宫崎注意到中世贵族的“家本位”与近世士大夫的“个人本位”，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君主逐渐脱离皇族这一集体，在限制削弱皇族权力的同时，不断强化君主自身的权力。不过，宫崎的研究仍局限于对唐宋变革结果的静态描述。他虽然强调了兵制变革和科举制度对天子独裁权加强和中世贵族衰弱所起的作用，但仍未能就唐宋之间变革的过程作具体阐述，尤其是对中晚唐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下君主权的运作情况，未能具体、深入阐明。

在内藤和宫崎的带动与影响下，日本的唐史学者开始从制度的角度梳理审视唐代，这一研究路径逐渐受到学界重视，不少学者通过探讨唐朝在政治领域中的变化来揭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与社会形态变迁。如那波利贞认为，玄宗时期处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的时代，他分析了开元时期行政体制的变化，指出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被移到中书省内之后，遂改称中书门下，其具体事务由设置在政事堂后面的五房负责，这表明象征贵族政治的门下省权力的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担任皇帝秘书的中书省的实力扩张。^② 松本保宣通过研究唐前后期待制官的区别并比较唐前期正殿对奏与唐后期的延英殿对奏，探讨君臣关系的变化，指出在唐前期随意的、充满人情味的君臣关系基础上实行的待制官，到唐后期逐渐转变成被时间、地点与职务所限定的有组织的东西，这表明君臣关系走向制度化，也可看成皇帝走向独裁专制的先兆。同时，安史之乱后开始实行延英殿对奏，到贞元十八年延英殿对奏完全取代正殿对奏，导致君臣之间直接争论的消失。在松本看来，这意味着宋代皇帝专制化的开端。金子修一则从国家祭祀礼仪的角度考察了唐代君主权的扩张，他比较了从汉至唐的郊祀与

① [日] 宫崎市定：《宋元的经济状况》，原载《世界文化史大系》第12卷《宋元时代》，1935年；后收入《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② [日] 那波利贞：《唐の开元末・天宝初期の交が时世の转变期たるの考证》，《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1937年；后收入创文社1974年版。

宗庙祭祀的变迁,认为总体趋势是逐渐重视郊祀,轻视宗庙祭祀。^①

国内研究方面,学者们注意到唐代君权的扩张趋势,如郭绍林指出,君主通过“调整中央机构的职能,设置各类学士,作为自己的贴身机要秘书,以贯彻自己的主张,加强自己的势力”,并认为“内朝不断侵蚀外朝,表明皇权在制约和反制约的矛盾中寻找突破口,以谋求一个合适的度,使皇帝的旨意得以贯彻”^②。的确,从高宗上元年间北门学士的设立到玄宗朝翰林学士的设立,表明君主在不断侵夺外朝官员的权力,加强君主集权。对此,程宗才亦指出,内朝的出现和持续存在是皇权与相权矛盾的产物,皇帝欲以内朝心腹来分割外朝宰相的权力,终于导致内朝宦官权力的恶性膨胀,促成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③更多学者从中枢权力体制切入探讨君权、相权的势力消长。这方面的研究不少,仅20世纪90年代就出版了数本个人专著。^④刘后滨跳出“三省制”的框驾束缚,将玄宗以后的中枢权力体制命名为“中书门下体制”,并对中书门下体制下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机构及其职权变化作了详细阐述,指出“从魏晋南北朝以尚书省为宰相机构,到隋唐之际三省共同构成宰相权力系统,再到开元以后和北宋时期以中书门下为宰相机构,不仅是宰相机构名号的变化,而且也是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这种变化表现为,一方面,“皇帝在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

① [日]松本保宣:《关于唐代前半期的待制》(松本保宣、垣见岳秀合著《论苑〈姬路工大·一般教育〉》4,1993年);《再论唐代后半期的待制与次对官》(《立命馆文学》533);《关于唐后半期的正殿廷奏》(《立命馆文学》537)。金子修一:《中国的皇帝制》(《讲座前近代的天皇5》);《关于唐代帝室的谒庙》(《国家和民众》)。以上研究成果的简介,见大野仁、金子修一《1994—1995年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隋唐)》,《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7期。

② 郭绍林:《论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机制》,《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③ 程宗才:《论唐前期内朝对相权的分割及影响》,《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④ 如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

台；宰相逐渐被纳入到政务裁决和执行部门的体系之中，更多地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与此同时，在中书门下体制下，“宰相通过中书门下对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处理的事务。从唐代中后期到宋朝，宰相职权进一步朝着掌管具体政务的方向发展”^①。

然则在君权扩张这一大趋势下，我们还应看到中国传统社会各朝代普遍存在的君权自身的势力消长。以唐代为例，虽然玄宗时期君主的意志已远远凌驾于大臣的集体意志之上，但是玄宗以后的唐代君主并未能延续这一趋势，相比唐前期，他们的权力反而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考察中晚唐储位之争，不难发现，中晚唐的君主几乎不能单独确定储位人选，尤其是懿宗朝以后，立储权作为君主最基本的权力之一逐渐为宦官所攫取；而且即使是按照君主意愿确立的储君，君主也没有保护他的能力。那么，对于君主集权进程中产生的权力倒退，该作何解释？刘后滨注意到在中书门下制下，“君主专制越来越强化的同时，皇权所受的制约也越来越强”。遗憾的是，他并未对此现象作更多的解释，只是认为“由于三省制的一些运作机制被吸纳到中书门下体制之中，制度上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有所加强”；同时，“原本在决策环节上沟通内外的机构成为了皇帝命令的执行者，为内廷学士和宦官的干权提供了新的权力空间”^②。虽然宫崎市定关于“唐宋变革”的见解基本上是沿袭内藤湖南的观点，在理论上并无突破，不过，宫崎注意到，即使是在贵族政治时代，君主权“不断地在削弱贵族制，企图使它变为纯粹的官僚制”的倾向。^③由此可见，无论是贵族制还是官僚制下，君主对权力的追求都是孜孜不倦的。

相对而言，笔者更赞同刘后滨的第二点解释，即中书门下体制为内廷学士和宦官的干权提供了新的权力空间。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制度的规范

①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同上。

③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三编《余论——再论自汉迄唐》，载《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5页。

力弱和执行成本高使得君主必须更多地依靠身边的亲信实现对国家的统治，作为君权的衍生物及其附庸——宦官、内臣（供奉内职的官员）的地位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宦官因君主扩张权力而荣显，受到器重的宦官在宣纳王命过程中不断侵削君权，打断了君权扩张的进程。正是由于君主对权力的无止境攫取，导致君权缺乏有效制约，宦官得以乘虚而入。在此后的大大部分时间里，是宦官代替君主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强力统治，宦官成为君权的实际代言人。这无疑是君权的倒退，中晚唐政局中的宦官专权正是这一倒退的具体表现。

上述研究通过分析君臣之间的权力变动，阐述中国传统社会的变迁或转型过程中的现象与特点，这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分期的划定无疑很有意义。不过，传统社会君权的研究仍属薄弱，或许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人治色彩过于浓厚，若从制度史的角度去研究，很难取得理想效果。不仅如此，有关君权与皇族地位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书提出，君主在不断削弱大臣权力的同时，也在限制皇族的权力、影响着皇族的命运，并最终决定君权的状况和王朝的兴衰存亡。关于此现象所蕴藏的深刻意义，将在正文中详细阐明。

针对李唐皇族的专题研究并不多，且局限于现象描述，普遍缺乏研究深度。值得一提的是，李锦绣在研究嗣王以下府佐国官的制度沿革时，发现“从魏晋到梁隋，国官府佐等从流内到视品，王公私属的地位已经降低。到唐代，这种下降仍在继续。武德时，亲王府国官中尚有铠、田、水曹参军事及家吏、百司问事谒者、司阁等员，贞观时，铠曹等三曹参军废，永徽时，家吏以下皆废。同时，王府官地位品级逐渐降低，亲王友、文学、主簿、掾、属、录事参军等阶品均降一二阶。到开元时，除亲王外，王公贵戚府佐国官一律取消，贵族拥有的占国家官制名额的私属被废弃”。^① 这一发现为本书研究李唐皇族的没落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证。至于唐代的储位，李树桐认为，唐朝以安史之乱为界，皇位的继承方式，前期以竞争立，后期以宦官立。^② 此论大致不差，不过关于唐后期储君的册

① 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② 李树桐：《唐代帝位继承之研究》，台湾《史学集刊》1972年第4期。